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 ——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刘建江

摘要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感性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2;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1-0090-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23WKYXZD016)

在《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是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错误所进行的无情鞭挞,其核心表现为“反对其方法论的论战”^[1](P246)。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用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拙劣模仿和粗暴歪曲,是一种“伪辩证法”^①;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经济科学”^[3](P426)和“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4](P601)。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获致的历史唯物主义成果^②,马克思不仅给予了蒲鲁东系列辩证法最为“刻薄”的嘲讽和批评,而且还展开了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感性改造和去神秘主义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③性质,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在《贫困》中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为切入点,拟从范畴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社会关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人的解放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这三个方面出发,具体考察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凸显马克思政治经济

① 这一伪辩证法被蒲鲁东称之为“系列辩证法”,它“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2](P627)。

② 这一成果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5](P199),它表明了马克思同蒲鲁东的彻底决裂。并且,这一成果“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6](P591)马克思接下来所从事的研究和批判工作。

③ 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指脱离具体科学的哲学的一个部分,它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问题^[7](P138)。

学批判的独特范式。

一、范畴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

在蒲鲁东看来,政治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8](P44),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形而上学。同时,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切经济事实。何谓事实?在蒲鲁东那里,事实绝不是一种“物质的事物”,而只是一种“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它“所证明的只是它所代表的那个范围内的观念”^[8](P166)。所谓经济事实,即经济领域和范围内的观念。这样一些观念是由理性的经济范畴所生产和建构起来的。在介入人的具体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领域时,政治经济学运用抽象理性将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感性因素进行抽离,并用无人身的经济范畴对其进行替代,从而构筑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例如,雇佣制是一个经济事实,这一事实是由资本、工资、劳动等经济范畴共同构建而成的,它表达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经济关系”^①,即资本以一定的工资形式同劳动进行等价交换。在这一经济事实中,不存在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的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和工人只不过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及其二者之间的感性社会关系,而只存在一定的经济范畴,及其所建构的理性经济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无嘲讽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先把人变成帽子(即物),再把帽子(即物)变为观念(即范畴),并把对这些观念(即范畴)的研究径直看成是对人的感性经济活动的研究,然后以“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9](P90)遮蔽人与人的感性社会关系。事实上,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这样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范畴和经济事实出发的。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通过分工、机器、竞争、垄断、捐税、贸易、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等十个经济范畴构筑了其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阐释了各经济范畴之间的矛盾机制,揭示了经济进化的逻辑序列。通过将这些经济范畴在其头脑中依序排列,蒲鲁东得到了一种关于经济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4](P600)。

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用一系列抽象的、固定的、永恒的经济范畴对经济关系体制和经济矛盾运动的说明,其实只是一种对社会经济实在进程的虚构,他用这一系列经济范畴所构筑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其实也只是一种先验的、自在的、天然的和现成的存在于历史之外的事实和关系。因为他既不懂得经济范畴只是对“生产的社会关系”^[4](P602)或“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抽象,也不懂得现实的经济运动的感性基础,更不懂得现实的经济运动的矛盾性和历史性。他只是用一系列空洞的经济范畴解释了一系列理性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却没有深入到作为事情本身的感性的生动的人的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中去说明这一系列理性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即没有揭示产生这一系列理性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的历史运动。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所谓的作为一种经济事实的雇佣制,和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甚至是作为经济范畴的资本,都不是现成在手的,而是有其感性基础和历史生成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制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经济事实,其根源于人的感性劳动的异化这一感性实践;资本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之所以能够生成,其得益于“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9](P198)。一言以蔽之,蒲鲁东用以建构其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抽象经济范畴和被“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10](P50)经济关系都有其自身的生成过程,都有一定的感性基础和历史条件。

对于蒲鲁东用经济范畴所描绘的纯粹抽象的经济学话语,马克思进行了感性批判与现实转换。当蒲鲁东向我们阐述资本以一定的工资形式同劳动进行等价交换这一经济事实时,他并不是在向我们说明感性的人的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本身,他所揭示的经济关系也并非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感性社会关系,而是“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理性关系。这一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通过抽

① 这一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社会关系的范畴抽象和经济学表达,即表现在经济范畴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的表达和显现不能脱离经济范畴。

象的经济范畴,把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资本家利用货币这一“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4](P130)所行使的对工人一部分感性生命时间的支配这一社会生活现实给深深地掩蔽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一感性的社会关系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自由平等的理性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包含感性对抗、冲突和矛盾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感性社会关系。对于这一感性社会关系,马克思明确将其指认为“生产关系”^[4](P599)(亦即“生产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的生产关系”),并指出经济关系不过是人的感性生产关系的范畴抽象,只是其在理论上的表现,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与政治经济学立足于经济事实,把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于感性的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把生产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①。把感性的生产关系同范畴的经济关系相区分,把感性的经济活动同理性的经济事实相界划,表明马克思洞见到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所内含的形而上学设定,同时也表明马克思抓住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本。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揭露和批判,正是从对经济范畴的批判和解蔽开始的。

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第一要素是生产力。这种蕴含生产力的感性活动本身,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表征着人与自然的感性交往关系,它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感性前提,也是现实的经济运动和历史运动的感性基础。立足于这种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以经济范畴对现实经济运动纯粹抽象的和非历史的建构。现实的经济(历史)运动之所以是一种感性运动,而不是一种抽象公式,就在于它根基于感性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之上,而不是根基于抽象的经济范畴和逻辑的理性经济关系之上。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感性的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而是“经济学家的教条”^[4](P599)(即经济理性),其用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辩证法,也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辩证法”^[11](P62),而是一种“冒牌的黑格尔词句”^[4](P598)。具体而言,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了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

其一,强调经济范畴的感性基础,批判了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先验性理解。

蒲鲁东认为,分工、交换、货币等经济范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一种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他用一种纯粹抽象的方法来观照整个感性世界,将一切感性事物的偶性全部抽象掉,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抽象的范畴规定,并将这种范畴规定“作为实体”^[4](P600),同时将这种范畴间的逻辑序列和抽象运动视为普遍理性——亦即蒲鲁东所谓的“永恒理性”^[10](P45)、“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理性”^[4](P609)、“社会天才”^[4](P609)和“人类理性”^[4](P609)——的实体性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经济范畴都是对感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抽象,都是其在理论和观念上的表现,都有其感性来历。这种经济范畴和由之所建构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是一种第二性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第一性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依附于一定的感性基础(即感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就其本原来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是一种“被规定在理性形而上学范畴中的生产关系”^[12]。囿于这种纯粹抽象的方法,蒲鲁东把一切感性的社会关系都抽象化了,并且把经济范畴同感性的社会关系完全割裂开来了。在他那里,一切感性社会关系都是经济范畴的本质体现,一切感性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也都得益于经济范畴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所信手拈来的经济范畴是凭空掉下来的,是一种“普罗米修斯的赠予”和一种先验的独立存在;蒲鲁东借助于范畴抽象的方法所描绘的经济矛盾的运动以及他用一种“脱离了个体的纯粹理性的语言”^[4](P599)所构筑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只是一种“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4](P601)和一幢“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4](P603)。经济范畴的固定性、不变性和永恒性,决定了以之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的先验性、抽象性和非

① 感性社会关系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物质)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的社会(物质)关系是其他一切感性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前提^[10](P43)。

历史性,也决定了以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先验性、抽象性和非历史性。

其二,强调矛盾的感性辩证性,批判了蒲鲁东对矛盾范畴的非辩证理解。

蒲鲁东自认为他用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一种“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2](P627),殊不知其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是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粗暴歪曲和拙劣模仿,并将其“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4](P602)。矛盾范畴是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整个《贫困的哲学》就是在阐释和建构一个经济矛盾运动的体系。在蒲鲁东那里,每个经济范畴都包含“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4](P604),这两者合在一起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4](P604)。蒲鲁东用以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是保留经济范畴中好的方面,而消除其坏的方面。例如,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分工的好的一面在于它是实现平等的方法,坏的一面在于它是贫困的源泉。对于这一矛盾,蒲鲁东的做法是保留“分工”的好的一面而消除其坏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作为“分工的逻辑反题”^[4](P621)的范畴——机器。同时,蒲鲁东还认为,不仅每个经济范畴自身包含矛盾,各经济范畴之间也有矛盾,其中一个范畴是“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4](P606)。解决各经济范畴之间的矛盾的方法是用一个新的经济范畴去消除和取代上一个经济范畴的坏的方面。例如,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可以消除分工的坏的方面,竞争可以消除机器的坏的方面,垄断可以消除竞争的坏的方面,等等。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蒲鲁东想要通过保留经济范畴中好的方面同时消除其坏的方面来达到产生一个新的经济范畴的做法,其实不是运用了辩证法,而是“切断了辩证运动”^[4](P605)。黑格尔辩证法中所内蕴的“巨大的历史感”^[6](P602),在蒲鲁东那里消失不见了。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所描绘的经济矛盾体系的辩证运动过程(即只保留好的方面而消除坏的方面)是一种极其简单和空洞的过程,是一种运动形态的抽象或“抽象形态的运动”^[4](P601),它不符合社会历史的实在进程。这种只保留范畴好的(即肯定)方面而消除其坏的(即否定)方面的做法,会阉割范畴自身内在的自发运动,使其“不再有内在的生命”^[4](P606)。这种对矛盾范畴的理解,也是一种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理解。马克思明确指出,正是由于事物的坏的(即否定)方面的存在,才会引起冲突、对抗和斗争,才会“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4](P613)。也就是说,与蒲鲁东从肯定的方面强调矛盾的辩证性不同,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来强调矛盾的辩证性的;与蒲鲁东所理解的矛盾是一种范畴自身内部的矛盾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是一种外在的感性的矛盾。

二、社会关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

研究对象的不同,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分野。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只强调经济范畴的先验性、固定性和永恒性,以及对矛盾范畴的纯粹抽象理解,蒲鲁东所谓的辩证法只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的绝对思辨的方法。而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方法,而是一种感性的历史的方法。由于认识到感性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之于历史实在进程的重要性,马克思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摆脱了黑格尔抽象的思辨的理性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并基于一种感性的立场和原则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者蒲鲁东。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感^①,这一历史感是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6](P602)。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重视历史,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方法论遗产,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这一遗产。在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能动性原则的基础上,马克思清除了其中所蕴含的伪历史主义,并赋予了辩证法以感性历史性。这一对感性历史的强调和重视,以及以感性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历史本质的透析,也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

① 这一方法是黑格尔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13](P140)问题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矛盾和发展规律”^[13](P141)问题的研究中生发出来的。

以社会关系为核心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贫困》的理论主线。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就是社会关系,就是这一社会关系的历史展开,否定和抹杀这一社会关系就是对感性社会的实体性内容(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否定和消灭。由于这一社会关系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之上的,因此它不是一种“个人和个人的关系”^[7](P135),而是一种“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7](P135)。与蒲鲁东在纯粹抽象的永恒的经济范畴中把握人的社会关系不同,马克思强调在感性的历史运动中来把握这一关系。因为这一关系是由社会的感性历史运动所生产和建构起来的,它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和暂时性的感性的历史性关系,而不是一种逻辑前的、理性前的抽象的非历史性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历史运动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主体——即实体—自我意识,亦即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4](P342)——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展开的活动,而是马克思所指认的社会实在主体^①之展开自身实体性内容的自我实现的活动。这一社会实在是一种人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6](P470)存在,而不是一种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6](P470)的产物;同时,这一社会实在的实体性内容(即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既定的、既与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人们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6](P470)结果。

如上文所述,既然马克思认为历史感是黑格尔辩证法最为重要的遗产,而这一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同时又意味着绝对主体(即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自我实现的活动(历史),那么,只有在剥去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神秘的形而上学外衣之时,“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历史才能真正开显出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社会关系为核心,通过对实在主体(即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即社会关系)历史展开的感性揭示,并从辩证法的原则高度理解和把握社会关系,马克思不仅戳穿了包裹在现实社会关系之外的形而上学外衣,而且实现了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感性改造和历史拯救。进而言之,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感性改造和去神秘化,意味着被黑格尔所抽象了的和形而上学化了的现实的历史的真正开显,而在《贫困》中马克思又是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公开阐述了他关于这一现实的历史的基本理论——后来这一理论被恩格斯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6](P597),亦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经由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感性改造而来的(感性)辩证法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亦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因为这种(感性)辩证法建基于感性的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上,并表征着这种感性的“社会生活之实体性内容的揭示和展开”^[15]。在《贫困》中,基于对社会关系的感性历史考察,马克思深入到了对社会历史实体性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之中,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历史性。

蒲鲁东认为,历史不是一种“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4](P598),而是一种“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4](P598),是一种与“范畴的逻辑顺序”^[4](P607)相一致的历史。由于不懂得社会历史的实在进程,不懂得经济形式的暂时性和历史性,只懂得上帝和普遍理性,蒲鲁东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神圣的历史,而不是世俗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一定的经济范畴,还是一定的感性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它们都不是一种永恒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暂时的和历史性的”^[10](P44)东西。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谬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10](P42),既不懂得这种现代社会制度的内在运行规律和感性来历,也不懂得这种现代社会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性。经济规律、原理和范畴的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意味着以之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经济关系的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同时也意味着以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明,以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伪科学,是一门非历史的科学,因为它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是一种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4]

① 这一实在主体不是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的概念、范畴和抽象,而是一种现实的、特定的和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感性社会,是一种由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而构成的社会。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只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4](P25-26)。

(P612),而不是一种社会历史实在进程自身内蕴的“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10](P225)。

在蒲鲁东那里,经济范畴是“一切事物的实体”^[4](P600)。这些经济范畴运动的历史,就是一切事物的实体运动的历史,或者说就是历史本身。对于这种历史而言,时间序列是无足轻重的,逻辑顺序才是最为重要的。蒲鲁东这种把经济范畴同感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割裂开来,并把经济范畴的纯粹理性运动所构筑的观念历史同由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构筑的感性历史割裂开来的做法,其实是“彻头彻尾地曲解了历史”^[16](P279),也暴露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性形而上学本性。因为这种由范畴的逻辑理性运动所构筑的观念历史,所体现的只是感性历史的“个别的侧面”^[14](P30),它遮蔽了感性历史的实在进程和内在规律。而与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切中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一理性形而上学要害。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一种与感性时间无关的纯粹理性的观念运动,历史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也不应从与感性时间无关的纯粹的观念的范畴的理性中去寻找,而应从作为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感性的人的经济活动(即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求。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感性的人与人之间建立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感性关系一旦确立,它就变身为规范和支配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普遍法则。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当社会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发展不协调时,这种关系会促使感性的人“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4](P602),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在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就会产生怎样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是属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关系的破坏和变更,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种感性的人的经济活动的表现,都表明感性的现实的历史是运动的,而不是永恒的停止不动的。蒲鲁东这种脱离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将经济关系视为一种独立的关系,并将经济规律视为一种抽象的永恒规律的做法,其实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这一做法也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4](P616)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4](P644)。

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非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批判,马克思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这一历史主义原则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批判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批判,它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的经济形态作为其研究、批判和解剖的对象,以期从中发现感性的历史运动的规律。这一历史批判具有三重指向,它既指向对感性社会中现实的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的批判(即政治经济批判),又指向对奠基于这种感性社会的现实政治经济历史过程之上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还指向对这一意识形态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历史,而且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观念,并在这双重批判的基础之上揭示了政治经济学所内含的形而上学设定。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了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创立了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5](P295)。

其二,发展性。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历史性意味着暂时性、发展性和非永恒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既产生和发展于感性历史运动的真实展开过程中,又会在这种感性历史运动的真实展开过程中走向消亡。以这一感性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为研究、批判和解剖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所发现的感性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也都是暂时的、发展的和非永恒的。与蒲鲁东企图用经济范畴先验地构想出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公式不同,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阐释本身就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P603)。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所构想出来的“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P526),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空话”^[4](P526),因为它不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4](P526)的,而只是从其“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4](P601)。马克思明确指出,任何离开了对运动发展着的现实的社会历史实在进程的研

究,而空谈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普遍)规律这一做法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41](P526)的。

其三,超越性。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不仅仅是一条经济学规律,更是一条历史规律。因为他对这一规律的把握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9](P22)和超越性——亦即从对其“必然灭亡的理解”^[9](P22)——方面去把握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审思也既是立足于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又是超越于这一感性现实之上站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位阶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P502)来进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介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并不是要像蒲鲁东那样构建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理论体系,而是要揭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历史进程和内在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条资本逻辑的超越之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也不是赞同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的理解和阐释,而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靶子披露其内在的理性形而上学之病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剂去除资本逻辑之弊的良方。

三、人的解放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

囿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限制,蒲鲁东既忽略了感性历史的实在进程,又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本就蕴含的感性对抗、冲突和矛盾。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工人罢工、经济萧条、经济衰退等现实物质利益的对抗、冲突和矛盾时,蒲鲁东只能将其解释为经济范畴自身的逻辑对抗、冲突和矛盾。在他那里,感性世界中的对抗、冲突和矛盾是经济范畴本身所固有的,感性世界中所出现的经济问题和危机也是由于现实在其展开过程中偏离了经济理性本身所固有的逻辑运行机制而产生的。在面对工人创造的感性财富越多反而自身越贫困这同一个异化的社会现实时,与蒲鲁东试图诉诸经济范畴的矛盾运动来寻求解决之道不同,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感性的异化,而非纯粹的抽象的“思维的异化”^[4](P203)。从人的劳动的感性异化出发,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即过去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拥有一种统治和支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感性权力,这一权力并不源于抽象的经济范畴所拥有的逻辑力量,而是源于人类活劳动所创造的感性财富所拥有的物质力量;资本(即资本家)同劳动力(即工人)等价交换这一表象背后所隐匿的剥削和矛盾,也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冲突和矛盾,而是一种现实的人的感性交往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对辩证法批判本性的感性起源的揭示,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性,并在这一批判中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

面对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蒲鲁东对其进行了拙劣的模仿,并通过“正一反一合”这一公式的外在形式运用,建构了一个经济矛盾的范畴体系。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是“生命和精神最内在、最客观的环节”^[17](P543),否定是生命和精神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17](P543)。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其自身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身,并使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的。对于这一矛盾,与黑格尔将其指认为绝对理性自身的矛盾,以及蒲鲁东将其指认为经济范畴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不同,马克思将其指认为社会现实的感性矛盾。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虽然只表征着“思想的自我发展”^[10](P623),是一种形而上学范围内抽象理性范畴的逻辑反映,但它所揭示的东西却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生命运动和过程。这一辩证法虽然只是对现实历史作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阐述,但它却以批判的形式揭示了“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4](P201)。通过将黑格尔局限于形而上学范围内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运用于考察感性历史的实在进程,马克思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10](P623),它具有感性现实性的特征。当蒲鲁东想通过简单地运用范畴内部的矛盾和否定来阐述其整个经济体系中各经济范畴的生育、产生和演进过程时,他只是在范畴的矛盾中摇摆、转动和挣扎。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在经济范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不了新的感性事物和物质力量,而至多只能产生新的范畴和观念。新的感性事物和物质力

量是在感性矛盾的运动中产生的,是在一系列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关系自诞生之日起就内含着感性对抗、感性冲突和感性矛盾,表征着一种辩证的感性生命的关系,它在自我肯定的同时也包含着自我否定。蒲鲁东所谓经济范畴的矛盾就根源于人的感性经济活动或经济实践中物质利益的对抗和冲突,根源于生产关系自身所内含的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不懂得经济范畴的矛盾根源于生产关系中本有的感性对抗、冲突和矛盾,不去触碰和直面感性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对抗、冲突和矛盾,蒲鲁东仅从哲学(形而上学)层面分析和求解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之法注定是徒劳的。他所建构的自诩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仍旧“没有脱离神学的‘思维’”^[16](P225),而只是提出了一个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先验构想。他自视为对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其实也只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指责”^[18](P669),暴露了其“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11](P61)的立场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伪科学性。具体而言,通过对辩证法批判本性的感性起源的揭示,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性,并在这一批判中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

其一,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指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4](P616)。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用革命性和科学性来指代同一门理论学说是矛盾的。因为当我们说一门理论学说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往往意指其批判性,但批判总是基于一定的主观价值立场的评判;而当我们说一门理论学说具有科学性的时候往往意指其客观性,即其结论是基于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立场得出的。这似乎表明,革命性与科学性是不兼容的,作为一门理论学说的科学只能是非批判的和非革命的。但在马克思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蒲鲁东标榜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在面对感性世界的现实物质利益对抗、冲突和矛盾时,只知道逃避和忽视客观存在着的感性现实而企图用范畴抽象的方法诉诸经济理性以寻求一种万能的“科学公式”解决问题。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作为一门理论学说的科学,它不是从先验的公式中非批判地导引出来的,而是从对感性“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11](P58)导引出来的。因为感性的历史运动本身既包含着一系列的感性对抗、冲突和矛盾,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冲突和矛盾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这种感性的历史运动本身是一种批判的和“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11](P58),亦即一种革命运动。并且,这种从感性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导引出来的科学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内容,不来自任何一种主观的价值判定,而是一种对感性历史运动的客观描述,它并不回避和忽视感性历史运动本身所内含的革命要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这样一种科学,它兼具革命性与科学性。立足于对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考察,马克思既揭示了资本的文明一面(如它对生产力的促进、对社会关系的发展、对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对高级社会形态要素的创造等),又披露了资本的野蛮一面(如它所带来的贫困问题、剥削问题、垄断问题和异化问题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阐释了客观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历史由来,并从这一本身就创造着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物质手段和萌芽”^[19](P928)的感性历史运动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的结论。

其二,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实证性,指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历史运动的科学”^[4](P616)。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虽然以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这三重身份自居,但由于不懂得一切经济关系的感性起源,以及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感性之法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感性之径,蒲鲁东又远在这三者之下。从经济事实出发,蒲鲁东标榜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但这一所谓的实证科学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这些既定的经济事实的感性来历,又没有抛弃思辨哲学的幻想。在对社会贫困和人的解放问题的探讨上,这一所谓的实证科学不是从感性的社会现实出发,而是从一种“理想化的现实”^[4](P616)出发,并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用一种先验的方式来阐述一种所谓的“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18](P669)。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蒲鲁东只是在他“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4](P616),他的政治经济学也并非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他诉诸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方式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和空想

性。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实证科学既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因为它“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9](P19),同时又是一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为它离开了思辨的哲学基地来“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4](P526)。面对社会贫困问题,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它的消极一面,更看到了它的积极一面。因为在这一产生了社会贫困问题的感性历史运动中,既包含着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物质手段和萌芽”,又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感性物质力量。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而言,是一种消极的东西,然而在产生这一现代贫困问题的历史运动中也蕴含着对贫困的积极的扬弃。这一扬弃既意味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同时也意味着未来新社会的生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不仅体现在它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更体现在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实在进程中找到了实现这一感性革命和完成人的解放任务的感性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在《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解放任务的达成在于“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4](P655),而这一前提的实现在于从旧社会的胎胞里催生一种最强大的生产力。这种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4](P655),它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是促使生产关系变革的感性动力。与蒲鲁东“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4](P653)不同,马克思确切指明了全部的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批判、消灭和改变现存状况。

综上所述,在《贫困》中,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伪辩证性、伪历史性和伪科学性的彻底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明确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基础,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和科学性质,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历史,更批判了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观念(即政治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意识形态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即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一批判不仅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科学属性——“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系列辩证法到“真正科学的辩证法”,从理性辩证法到感性辩证法,马克思披露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异常空洞”^[10](P52)和“惊人贫乏”,展开了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感性改造和去神秘主义的努力。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指出,虽然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10](P280),但他用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10](P280),这一方法“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我(指马克思——引者注)的方法”^[10](P280)。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的“跋”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他的辩证法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9](P22)方法,因为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9](P22)的。这一辩证法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感性辩证法,一方面在于它离开了思辨的哲学基地,并以社会实在实体性内容自身的感性展开为研究对象,批判了思辨哲学研究对象的虚妄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对社会实在的认识本身就是从对这种自身就包含感性对抗、冲突和矛盾的“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导引出来的,并揭示了社会实在在展开其自身实体性内容的历史过程中所遵循的感性法则。马克思在《贫困》中这一对辩证法的感性致思路向和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性质的批判路径的阐释,也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以深化。

参考文献

- [1] 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杨慧康、郭从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8] 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2] 王德峰. 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方法. 哲学研究，2013，(9).
- [13] 卢卡奇. 青年黑格尔. 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吴晓明. 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哲学研究，2018，(10).
- [16] 卢森贝. 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 郭从周、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17]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Perceptual Reconstruction of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cism Of Metaphys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Liu Jianjia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arx not only criticized Proudhon's series of dialectics and Hegel's rational dialectics but also conducted per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m. The core of Marx's criticism of Proudhon's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thoroughly uncover and criticize its metaphysical nature. Through uncovering and criticizing the category abstraction method of Proudhon's political economy, Marx revealed the perceptual source of the economic category and explaine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hi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the disclosure and elimination of pseudo-historicism in Proudhon's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on the basis of social relations, endowed dialectics with real historicity, and demonstrated the historicism principle of hi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the exposure of pseudo-criticism and abstract positivism in Proudhon's political economy, Marx clarified that hi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a "revolutionary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ical movement", highlighting the revolutionary dimension of hi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Proudhon's metaphys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not only discussed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but also investigate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thus realizing the initial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Key words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erceptual dialectics; the metaphys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